

目 錄 Contents

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感言	周佳榮	1
❖ 講座特輯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紀要	盧嘉琪、彭淑敏、黃曉恩	2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各講中文摘要	周玉鳳譯	6
❖ 香港研究 ❖		
香港保良局的成立和發展	丁 潔	10
❖ 研究札記 ❖		
香港學界的日本研究——書刊及論文出版繫年	周佳榮編	21
近刊香港抗日歷史專著簡介	彭淑敏	28
❖ 學術活動 ❖		
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簡報（2006年下半年）	資料室	31
香港學術文化活動簡報（2006年下半年）	資料室	32

* 本期封面：泰國曼谷玉佛寺，照片由范永聰博士提供，謹此致謝。

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成立五周年感言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 2002 年 1 月成立時，在香港各大專院校之中，是唯一專以歷史學研究為職志的研究機構，在本地學術界有領先的意義。研究中心的成員包括本校歷史系教職員、研究生和研究課程畢業生等，並邀請校外知名學者擔任榮譽研究員，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基督教史、女性史、中外關係史、亞太史和香港史研究，以及收集有關方面的研究資訊。

近代史研究中心的主要活動，是加強與海內外的研究機構合作，例如 2003 年 12 月與香港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合辦「近代中國留學生」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 年 6 月與福建師範大學嚴復研究所合辦「嚴復學術思想」研討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的活動很多，包括 2004 年 6 月的「香港史家與史學」研討會，2006 年 5 月的「陶行知與近代中國」研討會等。與西方學者的交流也逐漸增加，2006 年 4 月舉行的「中國與世界高等教育史」研討會便是一例。

與海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亦是我們的重點活動之一。2003 年 2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訪問團來訪；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台灣、日本和歐美學者，應邀來港作學術演講的多達數十人；本地學者參加研究中心活動的人數更多，在溝通不同院校和中外學者的同時，我們重視本校師生的參與和表現，致力使香港浸會大學成為歷史研究的表表者。

展望 2007 年，第五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將於 4 月舉行，近代史研究中心在慶祝成立五周年的時候，預定有一系列的活動，包括研討會、公開講座和專題交流等。《有志竟成一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2005 年）和《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2006 年）兩本專著，反映了研究中心同人近年的研究成果。《當代史學》是研究中心的通訊，2006 年 9 月已出至第 28 期；「香港研究叢刊」和「孫中山研究專刊」將陸續出版，還有《陶行知與近代中國》等專著正在編印中。今後我們將在中國歷史傳統和東亞地區的歷史文化發展等方面，開展新的研究課題。

❖ 講座特輯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金禧學術講座紀要

盧嘉琪、彭淑敏、黃曉恩

二〇〇六年是香港浸會大學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歷史系得到校方資助，特別舉辦「金禧學術講座系列」（Golden Lecture Series by Super Eminent Historia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五位蜚聲國際、著作等身的史學家蒞臨主講，分享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精闢見解及研究成果。

是次活動開幕禮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三日舉行，由校長吳清輝教授、協理副校長及社會科學院院長傅浩堅教授、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教授聯合主禮。講座系列共有五場講座，分別於九月及十一月間舉行，講場外同時展出五位講者履歷、榮譽及著作。講者及演講題目依次如下：一、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教授曼素恩（Susan Mann）主講「婦女在十九世紀中國思想裡沒有成為問題的原因」；二、澳洲國立大學榮休教授伊懋可（Mark Elvin）主講「清代死亡率與生育率：清中葉的長江下游流域」；三、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主講「北宋時期宮廷收藏的政治意義」；四、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艾爾曼（Benjamin Elman）主講「誰該為1600年後歐洲科學與技術傳入中國的局限負上責任？」；五、芝加哥大學顧立雅夫婦早期中國研究傑出貢獻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主講「中國古史年代學」。

五位史學巨擘運用不同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與在場聽眾分享中國歷史上不同年代的專題研究。再者，主辦單位更邀請本地十位來自不同大學的歷史學者為個別講座擔任詳盡講評，包括雷金慶（香港大學）、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朱鴻林（香港中文大學）、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陳榮開（香港科技大學）、呂宗力（香港科技大學）、王愛和（香港大學）、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Lauren Pfister（香港浸會大學）和陳永明（香港大學）諸位。此外，其他出席學人、學生亦踴躍發言，令「金禧學術講座系列」在熱烈討論、交流的氣氛下寫上完滿的句號，成果有目共睹。

為配合「金禧學術講座系列」之舉行，歷史系印備了一本長達二十六頁的彩色場刊，內容除全講座系列詳細程序外，亦有五位講者照片、自撰簡傳以及各講摘要。由於該場刊極具參考價值，本港各大學圖書館以及部分公共圖書館均有收藏，讀者可通過各館網上目錄進行檢索。此外，台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編製的《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亦有報導這場刊的出版，詳見其網頁 <http://ccs.ncl.edu.tw/ccsenews/a/epaper>。場刊以英文寫成，不過為照顧

不同需要，主辦單位特備有各次演講中文摘要，以散張形式與場刊同時在講場供出席者取閱。因此，為保存有關紀錄起見，特將當日曾派發之各講中文摘要原文再刊錄於本篇報告之後，以供參考。

最後，必須指出，是次活動實已引起學界以及部分公眾人士之注意，因此不論校內校外，有關報導也不少，詳見下表：

	校 內	校 外
消 息 性 報 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History Department Launches Golden Lecture Series by Fiv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Historians” (HKBU e-News, September 13, 2006). - <i>Graduate School Newsletter</i>, vol. 19 (December 2006), pp. 5, 7. - <i>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Bulletin</i>, issue 2 (2006/07), pp. 4-6. - “A Precious Chance 權威學者多角度詮釋歷史,” <i>HKBU New Horizons</i> 新領域, issue 1 (2006/07), pp. 18-21. - 浸大校園電視台節目：2006年10月11日、11月1日、12月8日、12月12日、2007年2月5日、2月15日、2月28日、3月8日、3月14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 September 2, 2006, EDU 5. - <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 September 9, 2006, EDU 6. - 《明報》，2006年9月14日，版A14。 - 《大公網訊》，2006年9月13日。 - 《中國新聞社、香港中國通訊社網訊》，2006年9月13日。 - <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 November 4, 2006, EDU 5. - 《星島日報》，2006年11月7日，版F7。
學 術 性 報 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盧嘉琪、彭淑敏、黃曉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紀要〉，《當代史學》（香港），8卷1期（2007年3月），頁2-5。 - 周玉鳳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各講中文摘要〉，《當代史學》（香港），8卷1期（2007年3月），頁6-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艾爾曼著，彭淑敏譯：〈馬戛爾尼的“謊言”〉，《廿一世紀經濟報道》（廣州），2006年11月27日，頁31。 - 出版訊息：<i>Golden Lecture Series by Super Eminent Historia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i>，《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台北），13期（2007年1月5日）、14期（2007年2月6日）、15期（2007年3月6日）。 - Kar-kee Lo, Agnes Shuk-man Pang and Joey Hiu-yan Wong, “Report: Golden Lecture Series by Super Eminent Historian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Asian Studies Newsletter</i> (Ann Arbor), vol. 52, no. 1 (2007), p. 12. - 盧嘉琪、彭淑敏、黃曉恩：〈性別、人口、藝術、科技、考古新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系列紀要〉，《書目季刊》（台北），40卷3期（即將出版）。

不能否認，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學術活動，也是歷史系同寅對金禧校慶的獻禮。負責統籌是次活動的劉詠聰教授正準備把所有演講文章結集成書。相信該書的出版，一定會對學術界作出更進一步的貢獻。不過在該書出版之前，如果想重溫各次精彩的演講，可參看香港浸會大學校園電視的播放，每週節目表及存檔視像節目可在此網頁瀏覽：<http://www.hkbu.edu.hk/~butv/tvguide/index.php>。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
程序表

～開幕典禮～	
日期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
時間	下午二時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主禮嘉賓	吳清輝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傅浩堅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及社會科學院院長） 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第一講～	
日期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
時間	下午二時半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講者	曼素恩（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教授）
講題	婦女在十九世紀中國思想裡沒有成為問題的原因
評論	雷金慶（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席	麥勁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講者介紹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第二講～	
日期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
時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講者	伊懋可（澳洲國立大學榮休教授）
講題	清代死亡率與生育率：清中葉的長江下游流域
評論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永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講師）
主席	朱益宜（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講者介紹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第三講～	
日期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時間	下午二時半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講者	伊沛霞（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
講題	北宋時期宮廷收藏的政治意義
評論	朱鴻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榮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主席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講者介紹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第四講～	
日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
時間	下午二時半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道校園賽馬會師生活動中心
講者	艾爾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
講題	誰該為 1600 年後歐洲科學與技術傳入中國的局限負上責任？
評論	Lauren Pfister（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教授）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主席	James A. Stewart（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講者介紹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第五講～	
日期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七日
時間	下午四時半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講者	夏含夷（芝加哥大學顧立雅夫婦早期中國研究傑出貢獻教授）
講題	中國古史年代學
評論	呂宗力（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王愛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主席	黃文江（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講者介紹	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簡介】盧嘉琪、彭淑敏、黃曉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金禧學術講座

各講中文摘要

周玉鳳譯

第一講：婦女在十九世紀中國思想裡沒有成為問題的原因

Why Women Were Not a Proble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Thought

講者：曼素恩（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教授）

Susan Mann,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三日

September 13, 2006

一八九五年前，支配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交談的課題，即所謂的「婦女問題」，一直沒有露出端倪。中國的領導人、政策制訂者以及國內經世思想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國家於十九世紀面對的許多迫切問題上，並希望「振興國家」，「富國強兵」。他們為國家自強訂下的計劃，喚起軍火庫、船塢和翻譯局的建設，也恢復農業發展。國家沒有提及婦女，亦沒有提及清晰劃分男主「外」（或男人主要控制公開／政治領域）、女主「內」（或婦女負責家庭領域）的中國家庭制度及其價值觀。原本為國家自強訂下的計劃，並沒有要求婦女在角色上有所轉變。雖然明治日本的革命領袖把婦女和家庭課題放在他們自己議程的核心，但一八六零至一八九零年間的中國領導人在改革時，卻鮮有把注意力放在婦女角色上。直至梁啟超發表其有關婦女教育的論文，呼籲在中日戰後出現的危機當中，婦女要往外上學並投身工作，中國的主要思想家才展開有系統的討論，後來發展成為二十世紀的「婦女問題」。

在此演講中，曼素恩探討在十九世紀政體中，婦女地位十分受保護的數個原因。她的結論顯示，二十世紀富革命性的議程掩蓋了中國婦女歷史中一個意義重大的部分，亦歪曲了我們對帝制中國後期期間兩性關係的理解。

第二講：清代死亡率與生育率：清中葉的長江下游流域

Mortality and Fertility in Qing China:

The Lower Yangzi Valley in the Mid-Qing Period

講者：伊懋可（澳洲國立大學榮休教授）

Mark Elvin, Professor Emeritu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五日

September 15, 2006

“清代死亡率與生育率”（Mortality and Fertility in Qing China，簡稱 MAFIQC）計劃創辦人伊懋可和 Josephine Fox 發現，能更多運用清代長江下游流域方志內數以萬計名“節婦”的簡短傳記，則可為當時這地區內大部分的重要人口統計變數推斷出可靠的近似值。這包括分年齡結婚率、生育率和男、女性死亡率。此計劃根據少於二萬個案而成，每個案最多涉及三十一個範圍，需要剔除很多細微的偏差，並需要把一些局部測度數以內在一致的方式，精細地互相連系起來。

此分析有助創出新方法，特別是對妻子的公公、婆婆的壽命作分析，從而把男、女性死亡率相連起來。另外，計劃以四個獨立資料來源，當中包括男童死亡率，為長江下游流域設立男、女性標準生命統計表。現時，其他研究人員對這地區，或其他擁有類似人口特點的地區內的縣和府作人口研究時，便有新工具使用。迄今為止，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的縣在平均壽命和其他測度數上有些顯著差異，這為經濟和社會歷史學家在尋求解釋時，帶來一些有意思的挑戰。

概率性電腦模型是此計劃的核心。根據數據某些方面所造的模型，都用作再產生其他方面的獨立或大部分是獨立的數據。以最簡單的例子說明，有了婦女的分年齡結婚率、丈夫和首任妻子年齡差異的頻率分佈以及男、女性分年齡死亡率，就能透過建立模型，比較初婚婦女的分年齡喪夫率，這些資料在數據中佔有其獨立位置。

數據庫將在澳洲國立大學一個網頁上找到，並能免費下載。提供免費下載的還有此計劃所有作重構之用的電腦程式（以 PERL 作程式語言）以及一系列簡短技術分析，內容關乎計劃中難解、需慎重對待的方面。這些包括把原文轉換成數字編碼、重構寡婦的分年齡再婚率以及使用“logit”系統。網頁初版會盡快在明年春季開放給使用者。

計劃的目的，是讓一直以來所作的努力盡可能透明化，從而能迎接別人的挑戰，好讓其他人能把計劃改善、變得精確和加以擴展。舉例說，數據庫的每個數字都有來源和頁碼參考。我們希望把這計劃想像為一個不斷聚集而成的工作。

為那些對特定結果有興趣的人，此計劃已確定，就整個地區而言，女性出生時的預計平均壽命為二十七點二年，男性出生時的預計平均壽命為二十八點五年。到了五歲，女性和男性的預計平均壽命分別為三十七點八年和三十九點二年。女性的毛生殖率為二點六，而婦女在整個生理容許的生育期間，該誕下五點四名初生活嬰，當中包括男、女嬰。

演講中，伊懋可將闡述 MAFIQC 計劃內的主要提綱和一些細節，會盡可能避免技術性的行話，但抱歉未能完全避免。

第三講：北宋時期宮廷收藏的政治意義

The Politics of Imperial Collecting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講者：伊沛霞（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Patricia Ebrey, Professor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日期：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September 20, 2006

中國的收藏歷史十分悠久。自古時開始，統治者已收藏宗教和世俗的物品，從祭祀用的禮器、文書、地圖，到金、銀、玉、珍珠等寶物，還有犬、馬以及各種珍禽異獸。戰國時代，家境富裕的人也開始收藏這些東西，他們的收藏甚至可以與統治者相頡頏。漢代以來，儒家學者輕蔑收藏珍貴物品和動物的人，卻敬重收藏書籍的人。在南朝，這種較學術性的收藏活動延伸至藝術類的作品，特別是名士的書法和繪畫卷軸。到了十一世紀，學者亦收藏古代青銅器和金石銘文的拓印，並開始編目。宮廷很快地跟進，這便是宋徽宗（一一零零至一一二五在位）不凡的收藏。宋徽宗收藏之精細，在他以前，沒有任何宮廷或私人收藏能媲美。其書法、繪畫和古器收藏的目錄均有相當篇幅，自成一書，所列物品超過八千件。雖然這批收藏中只有少於一百件流傳至今，仍然囊括很多早期中國藝術的傑作。

此演講探討宋徽宗的收藏活動，及其與政治、文化權力的關係。充實宮廷收藏並編目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活動，是宋朝宮廷展示其贊助士人文化的策略。同時，宮廷對藝術市場的介入，與宮外藝術的生產、流通和觀念，彼此互相影響。換言之，無論對藝術世界或官方機構而言，將許多富有文化意義的作品集中在宮內，都不是件小事。因此，透過研究宋徽宗作為一個收藏家，乃為中國史學研究中最基本的議題提供了新方向：即皇帝與知識份子間極度緊張的關係。他們在政治中互依互存，但所關心的事和採取的行動卻有所不同。就宋徽宗而言，他與士人階層的關係便相當複雜。在黨爭中，宋徽宗支持新黨那邊，排除舊黨，包括蘇軾等一時名流。但他仍然希望知識份子視他為文化贊助者，推行有宋一代最大規模的學校擴充，不僅在所有的州，甚至所有的縣均設立學校。此外，他在許多方面的表現也正如文人一般，寫作詩詞，創立自成一格的書體，並善於各種主題的畫。

關於宋徽宗的收藏活動，我提出四個論點。首先，徽宗在位時正是大力推廣宮廷收藏的好時機。由於皇帝與士人階層嫌隙已深，徽宗得設法在政治活動之外，與士人階層建立聯繫。此外，十一世紀下半葉，書畫鑑賞和批評有了重大發展，古器成為一項專門的收藏。因此，宮廷必須趕上宮外的發展，進而重新宣示其文化領導地位。

第二，宋徽宗收藏的政治意義，關鍵在於他將這項工作交託給秘書監。秘書監收藏的書法和繪畫，就像宋代以前大部分的書卷一樣，是以卷軸的形式保存的。負責管理徽宗收藏品的，是學問淵博、任職於秘書監的官員。秘書監卓越的聲譽也充分展現在他們的工作以及對收藏品的處理上。

第三，其收藏目錄（《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鉅細靡遺地展現出徽宗收藏計劃的文化政策。這些目錄提供了大量篩選、分類、列等和排序的證據，亦即經常含有政治意義的動作。以書法為例，《宣和書譜》突顯了宋初統治者以及佛僧、道士的文化貢獻。

最後，宋徽宗對其收藏所付出的努力驚人地成功。宮廷大量搜集珍品，必然會造成私人收藏家的蒐藏越發困難不過當時並沒有反對的聲音。那些批評徽宗興建花園為奢侈的人，並沒有如此譴責他收藏書籍和其他類似物品的欲望。並且，在汴京失陷、高宗南遷之後，他廢除了徽宗某些較不受歡迎的政策，卻決心重建宮廷的藝術和古器收藏。人民亦大力支持，大部分成功南移、蓋有徽宗御印的書畫，似乎都回到了宮中。人民都認為這些作品應當被保存在皇宮內。

第四講：誰該為 1600 年後歐洲科學與技術傳入中國的局限負上責任？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Limi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mission from Europe to China after 1600?

講者：艾爾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

Benjamin Elman,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日期：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

November 1, 2006

一八零零年前，中國國內由耶穌會監督的傳統工廠是在工業革命前，負責製造許多名貴藝術品和工藝品的地方。再者，中國本土的瓷器製造工業規模龐大，在十八世紀生產數百萬計瓷器銷售。單單這個例子，足見中國的瓷器製造工業與英國瓷器品牌 Wedgwood 的冒起和

英國在工業革命期間的大量生產有著能互相比較的有趣之處。可是，帝制時期的傳統工廠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末才走向現代化工業。為何要等待？一八零零年前，中國已為超過三億五千萬的人口，生產先進精良的書籍、紙張、瓷器、絲織品和棉織品。既然如此，為何要抹掉中國在科技上的技術和龐大的生產能力，而支持一個以歐洲為主體的說法，把現代科技的興起完全歸功於歐、美兩洲的工業革命？

第五講：中國古史年代學

Chronologies of Ancient China

講者：夏含夷（芝加哥大學顧立雅夫婦早期中國研究傑出貢獻教授）

Edward L. Shaughnessy, Lorraine J. and Herrlee G. Creel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Early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日期：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七日

November 7, 2006

自從司馬遷（約公元前一四五年至前八六年）宣佈自己無法把中國的政治紀事追溯至周厲王逃亡出走都城（公元前八四二年）以前的年份，歷史學家就一直設法解開這謎團——至少把中國的政治年代追溯至周武王滅商之年，若無法追溯至更早的年份。在差不多一百年內，劉歆（公元前四六年至後二三年）推算出周朝滅商之年為公元前一一二二年。雖然這個年份會繼續作為過去差不多二千年來的一個「標準」日子，但學者很久以前經已知道這年份是建基於對關鍵詞語的誤解和錯誤的計算法。隨著後來發現各種新的資料（包括古代銘文、出土文字和新的科學方法），在二十世紀，越來越多學者著手這項艱巨任務，並為西周編出超過五十個不同的年表。一九九六年，為了解決這場爭議，中國政府資助了一個多學科計劃項目，稱之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斷代工程」）。

「斷代工程」是自一七七零年代《四庫全書》的編纂計劃以來最大規模的人文學科計劃，超過二百名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包括考古學、天文學、古文學和校勘學。「斷代工程」進行的五年間，新聞報導不斷。其概述性的最後報告於二零零零年公布，中國的文化和教育當局隨即把它宣布為新的「標準」，更把它刻在北京「世紀壇博物館」外的石上。

不知幸運與否，隨後的新發現經已顯示，這個新標準同樣有嚴重錯誤。二零零三年一月，陝西省眉縣掘出一個青銅器窖藏，共出土銘文青銅器二十七件。這些銘文確實無誤地顯示，「斷代工程」對青銅銘文日期記錄的解讀完全錯誤，甚至需要對周宣王的在位年份——差不多已獲眾所公認為公元前八二七年至前七八二年——作重新考慮。此外，其他證據，包括眉縣出土的青銅器以及另一件首次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公布的銘文青銅器亦顯示，「斷代工程」給周穆王推算的主要在位年份亦是不可能的。

現時，在眾多公布的西周年表當中，唯一符合所有新近發現的證據，是倪德衛（David S. Nivison）與夏含夷所編的年表。在此演講中，本人將嘗試概述「斷代工程」的失誤之處，更重要的，是提出此計劃不成功的原因。稍後，本人將使用相同的證據，來展示本人於十五年前首次公布的年表一直都是最合理解決此重要歷史爭議的方案。

【譯者簡介】周玉鳳，原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現任職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香港研究 ❖

香港保良局的成立和發展

丁 潔

一、保良局成立的緣起和經過

買賣、掠賣婦女和兒童，在世界上有久遠歷史。廣東省向海外掠賣女子的現象，始自清朝咸豐年間（1851—1861年），直至1912年民國成立初期都還未停止。¹ 擁有四通八達的運輸網路的香港，是鴉片戰爭後出現的一個英國統治下的新興港灣城市，在這裏外國船隻進進出出，不受中國官吏的干涉，在向海外販賣人口方面具備各種有利條件。² 因此，“當1870年間，香港拐賣人口之風甚熾。香港為通商口岸，拐徒利用據點，以威迫利誘，將婦女幼童，販賣出洋，或為娼妓，或為婢女，或為童僕，以人作貨，使人骨肉分離”。³

其時，旅港東莞客商盧賡揚、馮普熙、施笙階、謝達盛等人見歹徒猖獗，且被拐賣者以東莞縣民居多，遂於1878年11月8日聯名具稟港督軒尼詩爵士，稱願意“集眾捐資，備儲官庫，以為懸賞購線之需，一經查獲，緝拿歸案，審訊定罪，即賞花紅”。⁴ 港府對此反應良好，由署巡理府法蘭些士草定《擬設華人保良會專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批准保良局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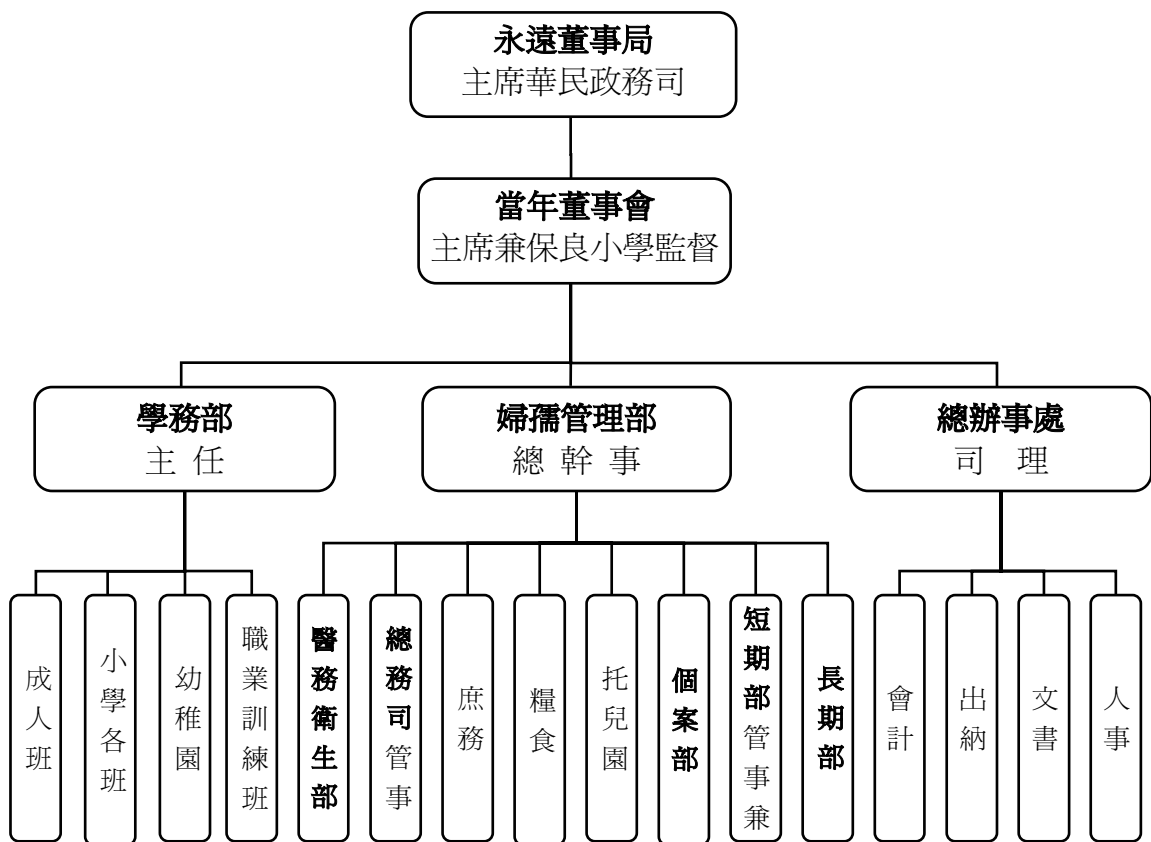
保良局設立之前，拯救、收容被拐婦女的任務是由當時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東華醫院承擔的。而在保良局的設立過程中，得到東華醫院各紳董的協助，出借了“平安”和“福壽”兩樓作為辦公及難民棲息之所。東華醫院與保良局在慈善活動中一向互幫互助，共同進退，人事上也屢有重疊，故有“東保一家”的說法。⁵ 由於港府對保良局的組織章程有諸多考量，故直到1880年才批准成立。但防範誘拐，實在刻不容緩，保良局於1778年就已逐步開展局務，救助婦孺。⁶

-
- 1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頁。
 - 2 可兒弘明著，孫國群、趙宗頗譯：《豬花——被販賣海外的婦女》，第29頁。
 - 3 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香港：保良局，1968年），第275頁。
 - 4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1978年），第137頁。
 - 5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第171—173頁。
 - 6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138頁。

二、保良局的組織與制度

由署巡理府法蘭些士擬出的《華人保良會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是保良局組織制度的基礎。根據 1894 年 3 月刊於憲報的局章，保良局的最高機構為董事局（即永遠董事局），由華民政務司為當然主席，行政、立法兩局華人非官守議員為當然副主席，其餘董事局各總理（即永遠總理）的遴選補充和任期則由督憲裁定。永遠董事局之下是董事會，由當年總理組成，是局務的執行機構。當年經理，最少六位，最多十二位，每年改選一次，由永遠董事局主席召集同人在局內公選產生，連選得連任。各總理互推一人為主席。這個組織制度，一直沿用到戰後。（表 1）

表 1 戰後初期保良局組織系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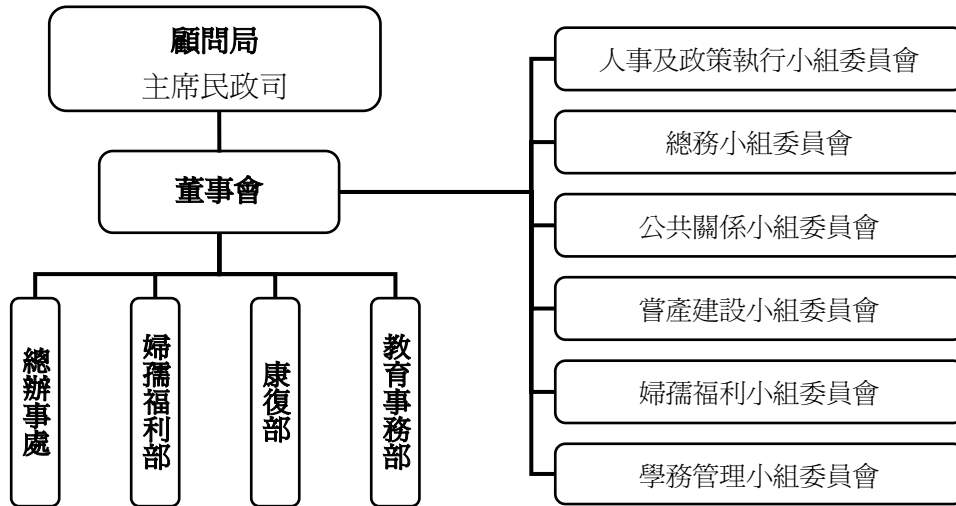


資料出處：方潤華等編《香港保良局史略》（香港：保良局，1968年），第 47 頁。

至 1970 年代初，舊有局章已施行了七十餘年，已失去了時代性。為適應局務發展和配合香港社會福利政策的推進，保良局決定修訂局章。1973 年 12 月 14 日，《保良局一九七三年法案》在港府憲報公佈。根據新法案，保良局的決策及執行機構仍是由當年總理所組成的董事會。總理仍每年改選，連選得連任，人數最少十二人，最多不超過二十人，互選主席一人，副主席不超過五人。永遠顧問局改為“顧問局”，人數不超過十五人，由下列成員為當然成員：民政司（當然主席）、民政署長、社會福利署長、行政局與立法局華人非官守議員代表各一名、上屆董事會主席；由港督委任不超過八名人士（任期不超過三年），由董事會選出不再連任的上年度副主席或總理一人（任期一年）。董事會下設六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負責人事及

政策執行、總務、公共關係、嘗產建設、婦孺福利及學務管理。此外，董事會還下設三個日常行政辦事機構：總辦事處、婦孺福利部、教育事務部，其後，又增設康復部。⁷（表 2）

表 2 保良局 1973 年組織系統圖



資料出處：《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1978 年），第 140 頁。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權回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由董建華出任第一屆特區行政長官，政府架構的若干職稱也有所修改，故保良局顧問局的當然成員稱謂亦隨之作了修訂。當然主席為民政事務局長（前稱民政司）；當然成員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1983 年民政署長由衛生福利司替入，職稱最後如上）、社會福利署署長（無修改）、行政會議成員從他們當中被提名的一人、立法會成員從他們當中被提名的一人（前為行政、立法兩局華人非官守議員代表各一人）、董事會前一任主席（無修改）。顧問局其他成員，一如以往。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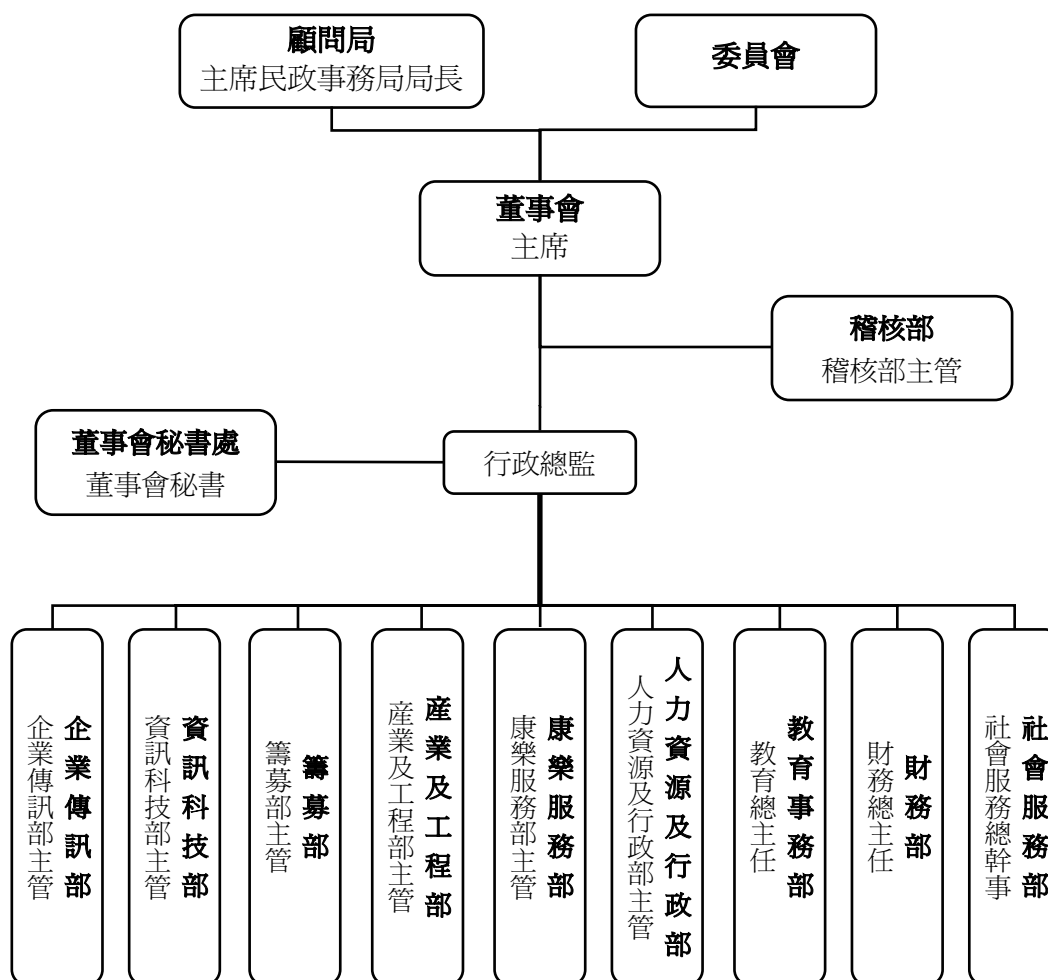
2002 年，隨著國際交流的不斷增加，《保良局條例》再次修訂，使保良局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事先批准下，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從事慈善活動。此外，自同年 4 月 1 日起，董事會轄下的功能委員會增至九個，分別為稽核委員會、社會服務委員會、校董會、校董執行會、康樂及文化委員會、籌募及傳訊委員會、人事及財務委員會、嘗產建設委員會、資訊科技委員會。同年 6 月，隨著總辦事處司理的退休，總辦事處分拆，董事會之下分設董事會秘書處、社會服務部、教育事務部、康樂服務部、籌募部、企業傳訊部、財務部、人力資源及行政部、產業及工程部、以及資訊科技部十個部門，分別向行政總監負責日常局務運作；另設稽核部專職內部審計，直接向主席負責。⁹（表 3）

7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 138—139 頁。

8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香港：保良局，2004 年），第 29 頁。

9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29—30 頁。

表 3 保良局現時組織系統圖



資料出處：《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香港：保良局，2004年），第31頁。

三、戰前保良局的主要工作及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的保良局，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1878年至1911年是成立初期；二、1911年至1941年是發展時期；三、1941年至1945年8月中是日佔時期。以下是保良局這三個時期的主要工作及其作用：

（1）成立初期（1878年－1911年）

1878年，一眾華人紳商發起成立“保良公局”，緝拿拐匪，救助、收容被拐婦孺。1882年8月，局章獲官方批准確立，保良局組織正式合法。1891年，獲准在東華醫院廣福義祠地段興建局址，1896年11月落成遷入。¹⁰ 其後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向清廷“租借”九龍半島由界限街以至深圳河以南地區，連同鄰近島嶼在內，稱為“新界”，為期九十九年。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地區，至此成為香港的三大組成部分。保良局的工作對象，其範圍相對擴大。

這一階段保良局的工作，是以防範誘拐，收容婦孺，安排領育、配娶，及調解家庭糾紛為主。其時由各總理（當時稱值理）負責，處理拐帶案件。每晚分傳各關係人到局，開庭審

10 《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香港：保良局，1998年），第7頁。

訊，錄取口供，由在場的總理簽署判決意見書送交首總理（即現在的主席）核閱，經同意簽押後，再送交華民政務司（當時稱為安撫華民政務司，又即後來的民政司，1997年後改稱民政事務局）定案。涉及拐帶或逼良為娼的人犯，交法究治，被拐者則暫由局收容，聽候華民政務司核准遣發。遣發方式通常是由保良局調查其父母親屬，交由他們領回團聚；如無親屬在港，則查知其原籍，備文至該地善堂，並差人護送由其發落。當時每年遣發或由親人領回團聚者有三、四百人，領育與遣配者則有數人至數十人不等。¹¹

（2）發展時期（1911年－1941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翌年中華民國成立，未幾清帝宣佈退位，清朝結束。但民國初年政局仍然混亂，社會動盪不安；1922年香港發生海員大罷工，1925年又有省港大罷工。1930年代初，世界各地都受到經濟大衰退影響，香港亦不能倖免，工商貿易進入艱苦經營狀態。1930年，保良局獲准第二次遷建局址於禮頓道三一五八號地段，而政府的經費補助，也自此開始。此外，1938年起，政府又遞增津貼一萬五千元，1939年該局獲准每年賣花籌款，使局務建設得以漸次推展。

二十世紀初期，拐帶之風未減，保良局的工作範圍仍與前一階段類同。直至三十年代後期，政府厲行禁娼，並實施禁止畜婢條列，誘拐之風日漸收斂。但因移民不斷湧入香港，社會問題隨之發生，被遺棄、被虐待，及缺乏家庭照顧的婦孺反而增多。¹² 所以保良局對婦孺的工作，由主要消極拯救遣發轉為積極收容教養，肩負起了增進其健康、灌輸其知識、訓練其技能、熏陶其品格的任務。而留局的婦孺，也由短期滯留居多轉為長期居留的佔多數。

（3）日佔時期（1941年－1945年）

1941年12月8日，日軍從中國內地越過羅湖邊界，侵略香港；至25日，日軍進駐市區，香港自此淪陷，長達三年零八個月，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香港恢復受英國管治。日佔時期（又稱日治時期）物資匱乏，物價暴漲，保良局收容人數激增，經費支拙。幸得各方救濟，總理們多方努力，始能勉力延續扶貧濟困的工作。¹³

戰前保良局自1878年成立時起，至1945年大戰結束時止，一共有五十六位主席，當中出任三屆主席的有馮普熙、陳鑑波二人，出任兩屆主席的有何獻墀、曾朝樞（維謙）、源冕旒（雲翹）、唐溢川、郭少流、譚煥堂、周錫年七人，其餘各人只出任一屆主席。（表4）所有主席都是華人，並無外國人士；而且全屬男性，反映了當時女士在社會上的地位較低。

表4 戰前保良局歷屆主席名錄

時期	姓名	出任主席年份
(1) 1878—1911年： 成立初期	盧賡揚（禮屏）	1878—79（戊寅）
	馮普熙（明珊）	1879—80（己卯）；1880—81（庚辰）；
	梁雲漢（鶴巢）	1881—82（辛巳）
	何獻墀（崑山）	1883—84（癸未）；1884—85（甲申）
	吳榮魁（炳垣）	1885—86（乙酉）

11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135頁。

12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136頁。

13 《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第35頁。

	陳步南（樹宸）	1886—87（丙戌）
	劉國祥（渭川）	1887—88（丁亥）
	衛文光（冕齋）	1888—89（戊子）
	黃再禧	1889—90（己丑）
	梁龍章（培之）	1890—91（庚寅）
	韋廷斌（朗山）	1891—92（辛卯）
	郭禮興（翼如）	1892—93（壬辰）
	周英翰（達堂）	1893—94（癸巳）
	葉長華（竹溪）	1894—95（甲午）
	葉遠昌（藹山）	1895—96（乙未）
	唐炳麟（星如）	1896—97（丙申）
	盧殿魁（冠廷）	1897—98（丁酉）
	李學林（秀軒）	1898—99（戊戌）
	馮穗祥（華川）	1899—1900（己亥）
	曾朝樞（維謙）	1900—01（庚子）；1908—09（戊申）
	古廷光（輝山）	1901—02（辛丑）
	容鴻圖（兆譜）	1902—03（壬寅）
	馮穗川（華川）	1903—04（癸卯）
	陳桂祥（蘭軒）	1904—05（甲辰）
	招錫康（晝三）	1905—06（乙巳）
	陳汝禎（作屏）	1906—07（丙午）
	陳正祥（瓊雲）	1907—08（丁未）
	林卓和（壽廷）	1909—10（己酉）
	胡兆英（海籌）	1910—11（庚戌）
(2) 1911—1941年： 發展時期	源冕旒（雲翹）	1911—12（辛亥）；1915—16（乙卯）
	李肇源（右泉）	1912—13（壬子）
	陳藻芬（洛川）	1913—14（癸丑）
	周的輝（卓凡）	1914—15（甲寅）
	老潔平（源清）	1916—17（丙辰）
	朱子卿（應鏗）	1917—18（丁巳）
	馮平山	1918—19（戊午）
	唐溢川	1919—20（己未）；1924—25（甲子）
	郭少流	1920—21（庚申）；1923—24（癸亥）
	李榮光	1921—22（辛酉）
	李順帆	1922—23（壬戌）
	李亦梅	1925—26（乙子）
	黃屏蓀	1926—27（丙寅）
	盧頌舉	1927—28（丁卯）
	馬敘朝	1928—29（戊辰）
	陳殿臣	1929—30（己巳）

	譚煥堂	1930—31（庚午）；1931—32（辛未）
	鄧肇堅	1932—33（壬申）
	梁弼予	1933—34（癸酉）
	伍華	1934—35（甲戌）
	伍耀雲	1935—36（乙亥）
	譚雅士	1936—37（丙子）
	區紹初	1937—38（丁丑）
	陳鑑坡	1938—39（戊寅）
	顏成坤	1939—40（己卯）
	羅棟勳	1940—41（庚辰）
（3）1941—1945年： 日佔時期	周錫年	1941—42（辛巳）；1942—43（壬午）
	陳鑑坡	1943—44（癸未）；1944—45（甲申）

資料出處：《保良局乙酉年年刊》（香港：保良局，2006年），第224—226頁。

四、戰後保良局的主要工作及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保良局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時期：一、1945年至1971年是戰後復興期；二、1971年至1985年是修改局章及變革期；三、1985年至1997年是持續發展期；四、1997年至今是回歸以來的特區時期。以下是保良局這四個時期的主要工作及作用：

（1）戰後復興期（1945年—1971年）

戰後初期，香港的經濟秩序得以恢復，但隨之而來的人口增長，環境複雜，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房屋、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負擔尤甚。此時，保良局的收容範圍日加廣闊，故而調整部門，擴充樓宇，加聘人員，增善設備；設立個案工作部門，審查考量入局婦孺的環境遭遇，以劃分對其進行長短期性的教養；建立家庭制度，開設學校教育和職業訓練班，使入局婦孺身處其中，既擔負了其飲食健康，又兼顧了其知識與技能的培養。除此以外，該局還有餘力兼顧局外勞苦大眾，配合香港整體福利政策的推進，開辦了托兒園和總理聯誼會中小學等。¹⁴

戰後香港擔任轉口貿易的角色，經濟漸趨蓬勃。但1951年韓戰（亦稱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宣佈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香港因此失去轉口貿易的收益。面對這個困難情況，香港開始建立自己的工業，大量生產出口貨品，主要有紡織業、製衣業、電子業、塑膠業等。保良局在戰後初期至1970年代初的這二十多年間，擴充了婦孺服務的規模，伸展了工作範圍，為日後更全面的發展奠定了穩固基礎。¹⁵

（2）修改局章及變革期（1971年—1985年）

1970年代開始，香港社會逐漸安定，隨着經濟起飛，香港與韓國（南韓）、台灣、新加坡並稱“亞洲四小龍”。港府方面，亦於1970年代初開始全面發展社會政策。保良局為適應局務發展，配合社會政策的推進，於是提出了修訂局章。1973年12月，港府憲報公佈了《保

14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第136頁。

15 《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第41頁。

良局條例》，以此代替 1893 年的舊章，並隨即實行。新的條例開闢了保良局的工作職權，使得該局的服務迅速增長，興辦了托嬰、托兒園，成立幼稚園、中小學，還發展弱智培訓、青少年康體服務及兒童醫療，並開始籌辦老人服務。¹⁶

1973 年的新條例出臺以前，保良局的條例中並不包括提供教育服務，因此只能以總理聯誼會的名義辦學，新條例賦予了該局興辦教育的權力。當時政府相繼發展衛星城市、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同時香港的人口也在一面增加，一面重新分佈。因此，該局向政府申請在各新區撥址，以保良局的名義興建了多間中、小學及幼稚園，以應付社會的實際需要。¹⁷ 1977 年香港康復工作白皮書公佈後，該局即向教育署申請開辦特殊教育學校，於 1979 年在彩雲邨創辦了全港首間政府全資助、為中度弱智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命名為“百周年學校”。¹⁸

此外，保良局在社會服務方面有住宿、日托、康復、安老四大範疇。住宿服務方面，該局在 1975 年試辦局外兒童之家，提供過渡性家庭模式居留服務，試辦三年成功後，於 1978 年在葵盛開辦了第一所兒童之家，而兒童之家亦在本港成為一項永久服務。局內日托服務始於六十年代，1974 年，該局又在托兒園服務外開辦了首間托嬰園，1979 年響應社會福利署試推兼收弱能兒童計劃。康復服務始於局內的弱能兒童組，1970 年代初，正式開展康復服務計劃，發展弱智培訓服務。1975 年，局內開設首間庇護工場，1976 年，開始於局外開設宿舍及工場，1978 年建立首間嚴重弱智兒童訓練中心，1982 年局內的弱能兒童組改為培能宿舍。隨著香港人口逐漸老化，政府開始著手為安老服務定下長遠發展方針，保良局亦開始於 1985 年正式制定老人服務發展計劃。¹⁹

隨著政府發展青少年康樂活動政策，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於 1979 年投入服務。1980 年開始，該局還與教育署合辦了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教育營。

（3）持續發展期（1985 年－1997 年）

自中英政府在 1984 年 12 月簽署聯合聲明，香港的政治進入過渡時期，其間保良局也持續有所發展，並進一步加強教育、社會服務和康樂服務：

首先，在教育方面，保良局除了繼續開辦各中、小學及幼稚園外，還注重加強學生語文能力，並開始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同時，面臨香港經濟轉型，以往勞工密集為主的工業轉為要求科技創意，社會對工作人口的教育程度要求提高了。保良局也應此形勢，陸續增辦了各類型的教育單位，邁向多元化教育理念的道路。1991 年，該局創辦了全港唯一的政府津貼預科書院“莊啓程預科書院”；翌年，該校更增設了夜校部。這可說是配合高等教育擴張的一個有效方法，為中學會考生提供較多升學機會，入讀預科課程，為將來升讀大學鋪路。1996 年，於荃灣開辦了首間教育服務中心，名為“嚴志教育服務中心”，提供各類型的補習班、輔導及興趣班，有助教育多元化發展。²⁰

16 《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第 71 頁。

17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64—65 頁。

18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66 頁。

19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48—58 頁。

20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67—68 頁。

其次，在社會服務方面，除了增善原有服務外，針對人口老齡化現象，積極拓展老人服務。1987年，該局首間老人日間康樂活動中心“樂華老人中心”正式成立，此後，各式老人服務單位相繼投入服務。1990年，於大角咀成立首間老人日間護理中心；1991年成立首間安老院；1994年在黃竹坑興建了首間內設三院舍的護理安老中心。其後，保良局又開設了七個服務單位，包括日間活動中心、日間護理中心及護理安老院等等，充分滿足了各區長者的不同需要。²¹

至於康樂服務方面，除了原有的北潭涌渡假營之外，1985年起，保良局又開始於元朗落實籌辦另一所渡假營。1994年7月，該營第一期工程完成，命名為“賽馬會大棠渡假營”，正式啓用。²²

此外，保良局還積極加強了與中國政府的溝通。1985年，局內首次發起組團北上交流，訪問團訪問了北京、上海兩地，打開了與內地溝通交流的途徑，使局方領導層加深對中國發展的理解，而中國有關方面亦可對保良局的工作增加認識。此後，該局一直堅持組團北上交流互動，維持至今。²³

（4）特區時期（1997年至現在）

1997年7月，香港順利回歸，實行“一國兩制”，政府架構作了一些改變，保良局的局章也相應有一些修訂。在這一時期，香港社會持續發展，保良局也相應拓展局務，擴大規模，1994年計劃加建福利大廈，並於1996年落成，命名為“莊啓程大廈”；1998年對外開放了保良局文物館展覽廳。²⁴

教育方面，保良局在1997年成立了教育研究及測試中心，專注對“德、智、體、群、美”五育做研究，以全面提高學生素質。隨著回歸後中港兩地的交往日益頻繁，新來港就讀的學生也增加了，保良局也加設了新移民的適應課程，服務有需要的來港人士。此外，為響應政府倡議的教育改革，該局於2001年開辦了全港首間非牟利優質私校蔡繼有學校，提供一條龍式的中、小學課程。該局還開辦了全港首間直資小學陳守仁小學和首間直資英文中學顏寶鈴書院。²⁵

社會服務方面，保良局自2000年開始引入家庭服務模式的服務，由住宿服務的社工為轄下幼兒園提供駐園社工服務；又於2001年開辦一條家庭支援電話熱綫，為社區人士提供個人及家庭輔導及諮詢；還另設課餘、暑假托管服務。為了更切合反映服務模式的轉變，2002年4月1日起，該局的“住宿服務”正式易名為“綜合家庭服務”。此外，2002年該局還新開一間婦女庇護中心，並設立熱綫，為遭遇及面對暴力的婦孺提供安全的照顧及輔導；另增設一條男士熱綫，協助他們適應壓力解決困難；2002年開設“如新家庭資源服務坊”，提供社區教育服務；由2003年開始，增設緊急寄養服務。2002年成功開辦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為弱能人士及其家人提供全面的社區支援服務。安老服務方面，該局於2002年成立長者援手網絡中心；同年開辦護理安老院“耆樂居”，並在觀塘區試辦“頤智園”，專為早期癡呆症

21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55頁。

22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74頁。

23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28頁。

24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38頁。

25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68頁。

患者提供照顧。²⁶

自回歸後至今，保良局配合社會發展提供改善民生的各項服務，單位由局內擴展到局外，為全港市民提供了優質專業的多元化社會福利、教育、康樂及文化服務，並仍在不斷增善服務，進取發展中。

總的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截至 2007 年為止，共有五十八人出任保良局主席。（表 5）當中擔任兩屆主席的，只有高卓雄、李俊農、趙聿修、許岳四人，而且都是在戰後初期；1957 年至今半個世紀以來，每屆都由不同的人士擔任主席一職，這情況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表 5 戰後保良局歷屆主席名錄

時 期	姓 名	出任主席年份
(1) 1945—1971 年： 戰後復興期	高卓雄	1945—46（乙酉）；1946—47（丙戌）
	李俊農	1947—48（丁亥）；1948—49（戊子）
	蔡昌	1949—50（己丑）
	趙聿修	1950—51（庚寅）；1951—52（辛卯）
	唐賓南	1952—53（壬辰）
	趙公普	1953—54（癸巳）
	李文祺	1954—55（甲午）
	許岳	1955—56（乙未）；1956—57（丙申）
	許岐伯	1957—58（丁酉）
	龐鼎元	1958—59（戊戌）
	夏傑榮	1959—60（己亥）
	馬錦明	1960—61（庚子）
	林文傑	1961—62（辛丑）
	鍾永康	1962—63（壬寅）
	關如彭	1963—64（癸卯）
	湛兆霖	1964—65（甲辰）
	陳超常	1965—66（乙巳）
	方潤華	1966—67（丙午）
	陳普芬	1967—68（丁未）
	許達三	1968—69（戊申）
董樑	1969—70（己酉）	
林勇仁	1970—71（庚戌）	

26 《保良局一百二十五周年特刊》，第 48—59 頁。

(2) 1971—1985 年： 修改局章及變革期	梁王培芳	1971—72 (辛亥)
	陳景福	1972—73 (壬子)
	李碩棠	1973—74 (癸丑)
	何耀棣	1974—75 (甲寅)
	李秉琳	1975—76 (乙卯)
	郭李宛群	1976—77 (丙辰)
	莊榮坤	1977—78 (丁巳)
	羅肇珍	1978—79 (戊午)
	蕭司徒潔	1979—80 (己未)
	趙振邦	1980—81 (庚申)
	林王兆淑	1981—82 (辛酉)
	胡永輝	1982—83 (壬戌)
	伍樹炤	1983—84 (癸亥)
	李葉慧璣	1984—85 (甲子)
(3) 1985—1997 年： 持續發展期	王敏超	1985—86 (乙丑)
	朱梁小玲	1986—87 (丙寅)
	陳鴻基	1987—88 (丁卯)
	曹金霖	1988—89 (戊辰)
	陸慶濤	1989—90 (己巳)
	莊啓程	1990—91 (庚午)
	趙金卿	1991—92 (辛未)
	曾少春	1992—93 (壬申)
	唐楚男	1993—94 (癸酉)
	王敏幹	1994—95 (甲戌)
	陳玉書	1995—96 (乙亥)
	李澤培	1996—97 (丙子)
(4) 1997 年至現在： 特區時期	莊悅祿	1997—98 (丁丑)
	黃永樹	1998—99 (戊寅)
	施展望	1999—2000 (己卯)
	李張慧美	2000—01 (庚辰)
	胡偉民	2001—02 (辛巳)
	李劉慧珠	2002—03 (壬午)
	王賜豪	2003—04 (癸未)
	陳亨利	2004—05 (甲申)
	杜偉強	2005—06 (乙酉)
孟顧迪安	2006—07 (丙戌)	

資料出處：《保良局乙酉年年刊》(香港：保良局，2006年)，第246—247頁。

【作者簡介】丁潔，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碩士。

❖ 研究札記 ❖

香港學界的日本研究 ——書刊及論文出版繫年

周佳榮編

引言

這個書目按出版年月的先後次序，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十多年來香港地區出版的日本研究論著，包括日本語文、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及中日關係，涉及港日關係的著作亦有不少，大體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香港學界的研究概況。當中有些是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著作，有些是外地學者在香港出版的初版或重印作品，相信遺漏在所不免，希望以後再作補充。

❖ 1950年

- 本年，衛挺生著《日本神武開國新攷（徐福入日本建國攷）》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53年

- 本年，衛挺生著《徐福與日本》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 1954年

- 本年，重光葵著，徐義宗、邵友保譯《日本之動亂》由香港：南風出版社出版。

❖ 1955年

- 本年，甘友蘭著《日本的政黨》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這是探討日本政黨發展的專著。

❖ 1957年

- 本年，甘友蘭著《日本通史》上、下冊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 1964年

- 本年，陶振譽著《日本史綱》由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陶振譽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訓導長。

❖ 1968 年

- 本年，《新日本月刊》（後改為雙月刊）創刊，由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編印，刊載有關日本的介紹文章和消息報導。

❖ 1976 年

- 本年，《徐福與日本》由香港：香港徐福會出版。

❖ 1977 年

- 本年，陳志誠編著《初級日語》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出版。

❖ 1978 年

- 9 月，周佳榮〈日本現代史的分期問題〉及陳湛頤〈坪內逍遙《小說神髓》的評介〉，刊於《抖擻》（雙月刊）第 29 期。
- 本年，莊蔡翠花編著《實用日語》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出版。

❖ 1979 年

- 4 月，陳湛頤〈日本的經濟小說〉刊於《海洋文藝》第 6 卷第 4 期。
- 5 月，周佳榮編著《日語常用詞匯分類手冊》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周佳榮〈近代日本的文學思潮〉刊於《開卷》第 5 期。
- 本年，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史——政治、經濟》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抖擻》（雙月刊）刊載多篇有關日本的論文，包括：陳萬雄〈吉野作造與五四運動〉（第 33 期）及譯宮川透著〈日本的近代化與西歐思想（一）〉（第 34 期），陳湛頤〈明治浪漫文人北村透谷〉（第 34 期）及〈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概說〉（第 35 期）。

❖ 1980 年

- 本年，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外交史——日韓關係》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抖擻》（雙月刊）第 36 期發表下列文章：周佳榮〈近代日本的名著〉；正田健一郎著、林啓彥譯〈美國對日本近代化的研究——其動向及問題點〉；宮川透著、陳萬雄譯〈日本的近代化與西歐思想（二）〉。
- 余均灼編著《現代日語語法概要》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81 年

- 本年，宮崎滔天著，林啓彥譯註《三十三年之夢》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宮崎滔天是明治時期日本浪人，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有密切關係，本書是他的自傳，當中保留了不少重要資料。此書另由廣州：花城出版社於同年出版簡體字版。
- 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史——三菱集團》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香港——香港日本人俱樂部創立 25 周年紀念號》由香港：日本人俱樂部出版。

❖ 1982 年

- 本年，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啓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另由北京：三聯書店於 1983 年出版簡體字版。
- 小思(盧瑋鑾)著《日影行》由香港：山邊社出版。

❖ 1983 年

- 本年，譚汝謙主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及《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兩種目錄較全面地概括了中、日兩國互譯對方書籍的情況。

❖ 1984 年

- 3 月，白爾奧(Kenneth B. Pyle)著，陳英和譯《日本國體的遠景——經濟大國的苦惱與自省》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 本年，葉德偉編著《香港淪陷史》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 1985 年

- 2 月，周佳榮著《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以日本的思想發展為脈絡，介紹了明治時期（1868—1912）、大正時期（1912—1926 年）及昭和前期（1926—1945 年）的出版活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於 1994 年印行了此書的台灣版。
- 本年，譚汝謙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三卷）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共收中、英、日文論文三十五篇。
- 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外交史——日蘇關係》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1986 年

- 本年，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史——自民黨》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1987 年

- 12 月，柳立言譯 M. B. Jensen 的《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Japan and Its World: Two Centuries of Change*）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包括〈1770 年代對儒家秩序的挑戰〉、〈廣求宇內知識〉和〈在二十世紀中尋求世界地位〉三講。原著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 1980 年出版。
- 本年，傅高義（Ezra F. Vogel）著 *The Impact of Japan on a Changing World*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傅高義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以《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o. 1*）聞名於世，曾於 1983 年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此書是根據他的演講寫成。
- 林天蔚、黃約瑟編《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由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出版。此書收錄論文十三篇。

❖ 1988 年

- 本年，譚汝謙著《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由香港：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本書是著者的論文結集。

- 譚汝謙主編《港日關係之回顧與前瞻，1845—1987：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25 週年特集》由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出版。
- 李谷城著《七彩日本》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

❖ 1989 年

- 本年，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史——三井集團》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陳湛頤編著《日語應對》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90 年

- 本年，廖達新著《日本現代史——社會黨》由香港：日本研究所出版。

❖ 1991 年

- 本年，謝永光著《戰時日軍在香港暴行》及譚汝謙編《反日改史怒吼集》二書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

❖ 1992 年

- 本年，Lincoln Li(黎令勤)著 *Japan Over Manchuria* 由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出版。
- 李活雄著《日語發音：香港人學習日語指南》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1993 年

- 本年，黃天編著《日本事典》由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出版。此書較全面地介紹了日本各種事物。

❖ 1994 年

- 5 月，周佳榮、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載有黃愈軒〈香港研究日本史及中日關係史的概況〉，是有關方面的研究述評。
- 本年，譚汝謙編〈近二十年港日經濟文化關係之回顧與前瞻〉載《香港留日學友會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 余均灼編著《現代日語語法詳解》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陳湛頤編著《日語應對續篇》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95 年

- 本年，陳湛頤著《日本人與香港——十九世紀見聞錄》由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此書敘述十九世紀下半期日本人所見的香港，分為〈日本的漂流船員與香港〉、〈幕末與明治初年日本訪美、訪歐使節團經港時的見聞〉和〈十九世紀後期日本各界人士的訪港見聞〉三篇。
- 高添強、唐卓敏編著《香港日佔時期：1941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
- 謝永光著《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97 年

- 本年，廖達生著《日本學叢書——評彈三菱集團》及《日本學叢書——自民黨今昔》由香港：新資訊出版社出版。
- 日本興業銀行產業調查部編《日本經濟大視野：21 世紀產業結構》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1999 年

- 5 月，原武道、陳湛頤、王向華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日語教育篇》由香港：向日葵出版社出版。
- 7 月，周佳榮〈日本學書目舉要——以有關日本史的中英文著作為主〉刊於《當代史學》第 2 卷第 3 期。
- 9 月，周佳榮著《亞太史研究導論》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此書收錄多篇有關日本的論文，包括〈日本的“東洋史學”及其背景〉、〈評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邁向 21 世紀的中日關係——竹下登訪華的歷史意義〉、〈日本史研究在中國的再開展（1945—1977 年）〉、〈“日本學”書目舉要〉、〈日本現代史的分期問題〉、〈日本天皇制的變遷及昭和天皇的評價問題〉等。
- 本年，原武道、陳湛頤、王向華編《日本與亞洲華人社會——歷史文化篇》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與琉球的文化關係〉刊於《香港浸會大學史學集刊》第一輯(香港：利文出版社)。此文探討琉球被日本兼併前後與香港往還的史事。
- 周佳榮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由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此書收有五篇關於近代中日關係的論文，包括：〈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及〈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
- 廖達新著《日本近代史縱橫》由香港：新資訊出版社出版。
- 《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 30 周年紀念》由香港：香港日本人商工會議所出版。

❖ 2000 年

- 8 月，周佳榮〈日本歷史的分期問題〉刊於《當代史學》第 3 卷第 3 期。
- 本年，家永三郎著，石曉軍、劉燕、田原譯《家永三郎自傳：一個歷史學家的足跡》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 2001 年

- 1 月，周佳榮〈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刊於《歷史與文化》第 2 卷。此文論述香港早期書刊對日本幕末及明治初年影響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史事。
- 6 月，袁昌堯、張國仁著《日本簡史》由香港：開明書店出版。此書共分五章，依次為〈古代日本〉、〈近代日本〉、〈現代日本〉、〈戰後日本〉和〈日本社會百態〉。

- 7月，沈仁安著《日本史研究序說》由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收錄北京大學歷史系沈仁安教授的論著三十多篇。

❖ 2002年

- 10月，林啓彥〈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演變：回顧與展望〉刊於《當代史學》第5卷第3期。
- 本年，《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四十周年特刊》由香港：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出版。

❖ 2004年

- 1月，陳湛頤、楊詠賢編著《香港日本關係年表》由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出版。此書分為戰前（1842年—1945年8月15日）、戰後（1945年—1999年12月）兩部份，內容包括重要事項、人物往來、經貿活動、文化交流及其他。
- 7月，張建雄著《日本情調》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此書以春櫻、夏綠、秋楓、冬雪為經，談季節之美；從溫泉和茶道酒道，看名物之美；又介紹懷石宴、刺身壽司及風味宴，話佳餚之美。張建雄著《日本經濟四大教訓》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論述日本過去二十多年間經濟發展由盛而衰的現象，並指出管理、海外投資、日本財富轉移和金融業四大教訓。
- 本年，李谷城著《日本：東方太陽島的神話》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共分八章：(一)天皇制度與皇室趣聞；(二)經濟大國的發達秘辛；(三)新科技與新發明；(四)大富豪傳奇；(五)文化與教育；(六)興旺的報業與多媒體；(七)社會問題與民風習俗；(八)歷史包袱與和平發展的障礙。
- 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大隊論文集》由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出版；周奕著《香港英雄兒女：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

❖ 2005年

- 3月，黃元淵著《近代日本的崛起》由香港：諾言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 5月，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由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聯合出版。
- 7月，余杰著《日本：一個曖昧的國度》、《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及陳湛頤編譯《日本人訪港見聞錄》上、下卷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張慧真、孔強生著《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 本年，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香港小組主編《香港在抗日期間》由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出版。

❖ 2006年

- 1月，周佳榮著《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由香港：商務印書館重印出版，增加〈延伸閱讀〉及〈重印後記〉。

- 3月，丁新豹、周佳榮、黃嫣梨主編《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由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出版。此書收錄論文三十八篇，專論留日學生的有容應莫〈1870年代“留美幼童”與1900年代留日學生的比較〉、高田幸男〈清末留日學生的整體性研究——試分析《各省官費自費畢業學生姓名表》〉、王雪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派遣留學生政策——1980年向日本派遣的97名本科生的追蹤調查〉、侯杰、高冬琴〈近代留日學生及其對日態度轉變評析——以新記《大公報》三巨頭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為例〉、林學忠〈法政速成科與留日法政教育〉、趙雨樂〈近代中國留日學生與軍國民教育主義〉、周佳榮〈近代中國留日醫學學生和他們的貢獻〉等。
- 10月，湯禎兆著《整形日本》由香港：天窗出版社出版。本書分“日本人辦”、“問題世代”、“述異城市”和“文化驚奇”四部份介紹日本年青人文化及社會問題。
- 11月，趙雨樂著《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由香港：香港教圖書公司出版。此書收錄了兩篇探討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的論文，一是〈何啓、胡禮垣的日本觀〉，二是〈留學生與軍國民教育主義〉；另有兩篇借鑑日本改造的論文作為附錄，一是〈大國的困局：論日本近現代的四次“維新”觀念〉，二是〈日本封建政治回顧：學者眼中的亞洲近現代化之道〉。
- 本年，李培德編著《日本文化在香港》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分為“早期香港日本文化和社會關係”、“當代香港的日本文化”和“香港的日本研究”三部份，共收錄論文九篇。
- 邱淑婷著《港日電影關係：尋找亞洲電影網絡之源》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 呂玉新著《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分為前部“古倭國女王，大王的誕生和聯合政體”和後部“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與天皇角色的演變”，共六章。
- 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共分四部分：(一)德川政權的危機；(二)現代革命：由明治維新至日俄戰爭；(三)日本帝國的興衰；(四)戰後與當代的日本。

❖ 2007年

- 1月，胡平著《100個理由——給日本，也給中國》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本書試圖從日本人的心靈、日本的民族性和中日文化差異等方面去探求人類悲劇出現的深層原因。
- 2月，吳偉明著《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本書收錄多篇文章，深入淺出地談論日本文化現象的種種。

【作者簡介】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研究札記 ❖

近刊香港抗日歷史專著簡介

彭淑敏

（一）中文著作

✿ 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輯；陳達明、黃雲鵬審稿《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年。（412頁）

本書分為四部分，依次為「背景篇」、「抗戰篇」、「人物篇」、「博物館篇」及〈香港歷史博物館「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口述歷史計劃」工作報告〉。日佔時期（1941-1945年）廣東境內的民間抗日組織相繼湧現，其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及由香港民間組成的港九獨立大隊，對中國抗戰貢獻良多。本書主要回顧東江縱隊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日事跡，由香港和內地對此段歷史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及原港九大隊的老戰士共三十多人撰寫而成，共有論文章逾三十篇，並藉此表揚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抗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周奕著《香港英雄兒女：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日戰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4年。（246頁）

本書講述淪陷時期香港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跡，當中港九大隊的戰史絕少為人所提及，作者特別強調昔日烈士們對保護香港所付出的奉獻精神。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章至第五章為「大營救」，第六章至第十章為「大對抗」，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為「大鋤奸」，第十六章至第二十章為「大反擊」，依次敘述了港九大隊的英雄史實及昔日烈士們的奉獻精神。港九大隊組成後，積極對日軍發動進攻，並與東江縱隊互相配合，保護漁民及海上航道，積極破壞日軍的海上運輸；又與盟軍和英軍合作，協助營救大批盟軍和國際友人，以及部署反日戰事。英國政府於1945年9月1日重新接管香港，港九大隊奉東江縱隊之命撤離，其後又應英方要求，自發組成自衛隊以協助維持新界治安，至1946年9月，自衛隊才陸續解散。

✿ 張慧真、孔強生著《從十一萬到三千：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牛津出版社，2005年。（261頁）

本書罕有地以戰時教育作為記述重點，通過淪陷時期香港教育的口述歷史，訪問了十八位從事教育的長者，包括蔡松英、劉錦文、譚月華、霍蕙馨、周奕、彭秀歡、李妙卿、彭永福、李崇健、麥穗林、黃澍芬、李廣林、麥淑堅、吳志倫、鄧雪芬、列航飛、黃子玲、董煥鑾等。書中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實況，這些親歷戰火的香港人，在日軍佔領下的三年零八個月

中接受教育的艱辛經過，學生人數由淪陷前的十一萬降至僅有三千，大部分學生被迫失學。末附有關學校簡介、報章資料選輯及圖片目錄。

✿ 楊克林、曹紅編著《說不完的抗戰》，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13頁）

作者楊克林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特約研究員，本書以人物、事件為主，運用文字和大量歷史圖片紀錄了中國抗戰的歷史，全面地講述中日戰爭的前因後果及中日兩國關係。內容分為六章，依次為：（一）跨入近代的中日兩國；（二）中國的局部抗戰；（三）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四）中日戰爭長期相持；（五）中國戰區大反攻與最後勝利；（六）附錄。封面及封底均印上抗戰犧牲者的姓名，全書貫穿著戰爭中的犧牲者及倖存者的照片和介紹，當中包括探訪國共將領及參加過抗戰的老戰士、平民、慰安婦等數百人；並拍攝和收集大量珍貴圖片以及紀錄證人的口述，內容十分豐富。

✿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香港小組主編《香港在抗日期間》，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218頁）

本書為一圖片集，內容主要分成三部分，包括：一、港九獨立大隊發動抗日游擊戰爭的英雄篇章；二、營救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三、自1937年抗戰爆發至1941年12月，香港輸出大量抗日的文化產品，包括故事片、紀錄片95部之多。本書提供生動而具體的材料，讓讀者回顧香港淪陷這段黑暗歲月的事蹟。

✿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2005年。（176頁）

本書是作者以親身經歷，憶述香港學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積極參與抗戰活動的事跡，他們並且組成香港學生賑濟會，作為香港學運的核心，為保衛國土付出寶貴的貢獻，作者希望藉這段歷史喚起香港年青人對祖國的關懷。本書內容分為十章，依次為：（一）國難當頭，人民要求抗日；（二）抗日救亡喚醒香港學生，青年孫中山壯志傳後人；（三）香港學生賑濟會在抗戰炮聲中成立；（四）轟轟烈烈的一九三八年；（五）兒童團；（六）女學團；（七）全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和國際青年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支生力軍；（八）回祖國去！上前線去！（九）頑固派破壞香港學生愛國運動；（十）古稀重聚，羊城碰杯。末附香港大學歷史系楊穎宇博士〈我的閱後感〉。

（二）英文著作

✿ Lindsay, Oliver,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8 pp.)

本書分為四部：（1）“The Beat of Drums”，有一章；（2）“When the Time Was Young”，共四章；（3）“Remember Them with Pride”，共十章；（4）“Hostage to Fortune”，共十章。這是有關二次大戰時日本攻佔香港的最新英文歷史專著，論述當時在港一萬二千名英國、加拿大、印度和中國保衛軍的英勇的事蹟和1941年聖誕節香港被迫投降的歷史，以及集中營的

苦況和日軍侵略時帶來的災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採用了大量未曾公開的官方資料和戰時日記等第一手史料。

✿ **Banham, Tony,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2 pp.)

「並非最微小的機會」(“Not the slightest chance”)是英國首相邱吉爾於1941年4月時評估日軍侵略香港的可能性，日軍於同年12月襲擊香港證明了他的評估極度錯誤。本書共有十章：第一章論述1841年香港開埠至1941年的百年歷史及二次大戰發生的原因；第二章簡述交戰情況；第三章至第七章按時序分別從四個階段詳細敘述戰時個人的參與，導致香港投降的歷史事件，內容表現出邱吉爾對日軍的輕蔑，其抵抗部署的混亂無序，以及戰爭的代價；第八章至第十章總結戰爭開始的情況。本書對當時的軍事策略亦提供了可觀的分析。

✿ **Skvorzov, Lieut A.V., *Hong Kong Prisoner of War Camp Life, 25 December,***

1941-30 August, 1945. Hong Kong: SCMP Book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113 pp.)

本書是香港抗戰時期集中營內的戰俘獨特而形象化的紀錄，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在被困於深水埗(Shamshuipo Camp)和亞皆老街(Argyle Street Officer's Camp)戰俘集中營的時候，偷偷地將當時的情景用素描紀錄下來。他的同伴包括英國人、加拿大人、印度人等，他們都是在戰時因參與皇家香港義勇軍(The 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為保衛香港而被日軍俘虜的。書內除了素描外，還有一些珍貴的照片和詩篇。

✿ **Stokes, Edward, *Hedda Morrison's Hong Kong: Photographs & Impressions***

1946-4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2 pp.)

《逝影留踪·香港1946-47》是一本圖片集。以拍攝中國景象而知名於世的 Hedda Morrison，於1946年居港六個月間，拍攝了香港自然地貌與民生百態，是很珍貴的材料。她的作品收藏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內，本書收錄的照片就是用 Morrison 的原底片精心沖印，配以攝影家 Edward Stokes 資料翔實、內容生動的文字說明，中英對照，圖文並茂，讓讀者重溫香港戰後初期的人情世態。

【作者簡介】彭淑敏，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 學界動向 ❖

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簡報 (2006年下半年)

※ 中國近代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06年9月26日舉辦「中國近代史講座」，邀請馮羽教授（南京曉莊學院語言文化研究所）主講「林語堂與中外文化交流」。

※ 中國文化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06年10月10日舉辦「中國文化講座」，由侯勵英小姐（浸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主講「新界侯族的傳統家族倫理——中國社會的個案研究」。

※ 基督教在華發展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於2006年10月28日舉辦「十週年紀念講座暨展覽」，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及中國基督教史學會為協辦機構。講座包括：（一）李金強教授「文獻部的度藏：以香港浸信會文獻為例」；（二）陳劍光牧師「大秦景教碑拓本考證」；（三）Prof. Lauren Pfister, “Shaking Heaven and Earth: Surprising Stories about Missionary-scholars, Taiping Rebels, and Little Known Chinese Christians”。展覽包括：唐、元時代景教在華發展歷史圖片展，元朝基督宗教飾物展，清朝耶穌會士在華瓷器展，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館藏展。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聯合出版的《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十週年紀念特刊》（2006），載有賀辭、讚辭、歷史回顧及紀念文章等多篇。

※ 中國歷史論壇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06年12月12日舉辦「中國歷史論壇」，由該中心副主任李金強教授主持，內容包括兩個講題：（一）劉石吉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講「中國城市史研究——課題·方法·檢討與展望」；（二）馮羽教授（南京曉莊學院語言文化研究所）講「陶行知思想與信仰之見證——從跨文化視角出發」。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向 ❖

香港學術文化活動簡報 (2006年下半年)

※ 羅香林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

為紀念已故史學大師羅香林教授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等多個團體於2006年11月4日至5日舉辦「羅香林教授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有逾百位中外學者參加，發表論文達九十多篇。

※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主辦2006年「亞洲文化合作論壇」(Asia Cultural Co-operation Forum)於11月8日至11日舉行，主題是「亞洲文化藝術的現代性」，內容著重探討亞洲文化的現代氣息和轉變，包括六個專題：(一)文化生態：在二十一世紀傳達當代藝術；(二)衡量創意、快樂及幸福；(三)創意教育高峰對談；(四)當代社會的媒體藝術；(五)體驗建築；(六)亞洲文化藝術的現代性。

※ 孫中山紀念專題講座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同學會於2006年12月4日晚上舉辦「孫中山先生一百四十週年誕辰紀念專題講座」，由張偉國博士主持，邀請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主講「從香港網絡到亞洲視野——孫中山生平和思想的再認識」，丁新豹博士(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主講「香港孫中山紀念館之籌劃與構思」。

※ 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學術研討會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院校合辦的「學藝兼修·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在香港大學明華綜合大樓及梁銚琚樓舉行，分為甲骨學 / 古文字學、簡帛 / 上古文獻、考古學與上古史、文化交流史、敦煌學、歷史學 / 潮學、宗教、藝術、古典文學等多個主題，發表論文百多篇。中外學者雲集，是2006年香港學界一大盛事。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